

经济学

Economics

上册

〔美〕斯蒂格利茨 著

Joseph E. Stiglitz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
科学
译丛



Stiglitz, Joseph E

Economics

Copyright © 1993 by W. W. Norton of Company, Inc.

(本书由美国诺顿出版公司提供独家中文版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 上册/ (美) 斯蒂格利茨 (Stiglitz, J. E.) 著; 高鸿业等校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5.
(经济科学译丛)

ISBN 7-300-02340-1/F·706

I. 经…

II. ①斯… ②高…

III.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

IV. F0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004 号

经济科学译丛

经济学 上册

[美] 斯蒂格利茨 著

高鸿业 吴易风 刘晓西 校译

姚开建 刘凤良 吴汉洪 等 译

出版 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编 10087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5.5 插页 5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49.00 元

《经济科学译丛》

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高鸿业 王传伦
胡代光 范家骧
朱绍文 吴易风

主 编 陈岱孙

副 主 编 梁 晶 海 闻

编 委 王逸舟
王利民
贝多广
林毅夫
李 扬
李晓西
刘 伟
朱 玲
金 碚
张宇燕
易 纲
徐 宽
高培勇
姚开建
盛 洪
樊 纲

《经济科学译丛》总序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的辉煌历史。近百年来，中国由盛而衰，一度成为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把中国从饥饿、贫困、被欺侮、被奴役的境地中解放出来。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走上了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决非易事，我们不仅需要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教训，而且要从别人的实践中获取经验，还要用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市场经济虽然对我们这个共和国来说是全新的，但市场经济的运行在发达国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市场经济的理论亦在不断发展完善，并形成了一个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虽然许多经济学名著出于西方学者之手，研究的是西方国家的经济问题，但他们归纳出来的许多经济学理论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行为，这些理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要想迅速稳定地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先进经济学理论与知识。

本着这一目的，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经济学教科书系列。

这套译丛的特点是：第一，全面系统。除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基本原理之外，这套译丛还包括了产业组织理论、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货币金融学、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重要领域。第二，简明通俗。与经济学的经典名著不同，这套丛书都是国外大学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大部分都已发行了几版或十几版。作者尽可能地用简明通俗的语言来阐述深奥的经济学原理，并附有案例与习题，对于初学者来说，更容易理解与掌握。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许多基本原理的应用受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或经济体制的影响，许多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上的，假设条件不同，结论也就不一定成立。因此，正确理解掌握经济分析的方法而不是生搬硬套某些不同条件下产生的结论，才是我们学习当代经济学的正确方法。

本套译丛于1995年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筹备并成立了由许多经济学专家学者组织的编辑委员会。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许多学者参与了原著的推荐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向所有原著的出版社购买了翻译版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许多专家教授参与了翻译工作。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时期，我们把这套译丛献给读者，希望为中国经济的深入改革与发展作出贡献。

《经济科学译丛》编辑委员会

1996年12月



内容简介

本书的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是美国较年轻的第一流经济学家，曾任美、英和其他国家著名大学教授，如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他也担任美国和国际组织的顾问，包括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局、世界银行、美洲发展银行等；目前是美国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

本书是第一次推翻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的西方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已被美国许多院校所采用。它将在萨缪尔森《经济学》之后成为西方的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入门教科书。

本书的特点为：

第一，体现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潮流，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即强调用微观行为去解释宏观现象。

第二，介绍了西方出现的新论点和新原理，如“菜单成本”、“寻找费用”、“不完全信息”、“隐性工资合同”、“李嘉图式的等价”，等等。

第三，说明了西方经济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如“委托代理关系”、“非对称性信息的后果”、“金融市场的某些弊端”、“企业在融资时如何在发行债券和股票之间加以抉择”、“企业的兼并和联合”，特别是“有敌意的兼并和联合”等等。

当然，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本入门教科书，本书也带有西方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和研究方法上的不当之处。因此，读者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



作者简介

被国际上公认为一代经济学权威之一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经济学的几乎所有主要学科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宏观经济、货币经济学、公共和公司财政、贸易、发展和工业组织。他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目前在该校教授“经济学 1”课程，这也是该大学里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他撰写并编辑了数以百计的学术文章和书籍，其中包括畅销的本科生教科书《公共部门经济学》（诺顿），以及与安东尼·阿特金森合著的《公共经济学讲义》。斯蒂格利茨教授在 1987 年创立《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刊物并担任编辑，该刊使其他主要经济学杂志因专业化所带来的阅读难度得以降低，他还是美国经济协会的前任副主席。他多次获奖，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协会为对经济学作出最杰出贡献的 40 岁以下经济学家所设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斯蒂格利茨教授现在与其妻子和四个孩子住在美国的帕洛阿尔托城。



译者序

本书的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是美国较年轻的第一流经济学家。他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以及几所其他国家高等学校的教授。目前，他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他于1979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仅授予年龄不超过40岁的青年经济学者。

斯蒂格利茨也担任美国国内和国际经济机构的顾问，包括美国财政部、劳动部、联邦能源管理局、联邦储备局以及国际组织，如欧洲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发展银行等。他现在是美国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团主席，并在今年（1996）对我国进行过一次访问。

斯蒂格利茨撰写了至少6本书籍和100篇以上的论文。他的著述涉及面很广，几乎遍及西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甚至包括对“泡沫经济”的研究，但他的比较有系统的研究领域似乎在于财政学方面；他的著作《公共部门经济学》已经被美国许多大学采用为财政学方面的教材。

本书是斯蒂格利茨撰写的一本入门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

（一）本书的独特之处

在西方，虽然目前存在着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然而，它们的内容却是大同小异的。大同小异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基本上全都沿袭以美国经济学者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另一

方面，它们大体上也模仿萨缪尔森撰写教科书的方法，即在论述该体系所涉及的理论时，补充一些与理论有关的实践资料和事例。

本书与上述为数众多的教科书不同，它推翻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并且形成自己的框架。在本书的原文版序言中，斯蒂格利茨写道：“那些经典式的教科书所阐述的原理已经不是今天的原理。马歇尔的教科书出版于100年以前；萨缪尔森的那本书也接近于50年之久。我们经济学者所理解的本学科的内容已经有了改变，以便反映变更中的世界；然而，教科书并没有跟上我们的步伐。”本书的主要特点即在于此。

为了理解本书的这一特点，必须首先对斯蒂格利茨所指的“那些经典式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演变过程加以简要论述。

在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三本流行的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入门教科书。它们之所以流行和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所形成的符合于各自历史条件要求的新理论体系。

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他著名的被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为了表述这一原理，他写道：“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①这段话的意思显然是说，以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能使整个社会得到最大的好处，其目的无非是用该原理来反对封建主义和论证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并且根据它来提出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的方针政策。由于在斯密生活的年代中，资产阶级属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先进阶级，所以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然而，在斯密以后的期间，当资本主义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以后，这一原理就成为美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斯密虽然提出这一原理，但却未能对它加以论证；于是，在斯密之后，西方学者致力于补足未能论证的缺点，并在论证的基础上对该原理进一步加以阐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以较通俗的语言做到这一点。

第一本流行的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是约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由于在穆勒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所以他在他的教科书中一方面尽量维护斯密的原理，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改善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案。他宣称，资本主义使得整个社会的财富得到巨大的增长，但“正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与劳动成反比——最大的份额分给那些从来就不劳动的人，次一个最大份额分给那些几乎只在名义上劳动的人；这样递减下去，劳动愈繁重和愈不愉快的人所分到的报酬也就愈少，直到最后，那些从事于最使人感到疲劳和最消耗身体的劳动的人们，反而连他们能否得到生活必需品这件事也没有把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册，246页，伦敦丹特公司，1955。

握”^①。因此，他主张由国家政策来调节收入的分配。换言之，穆勒在基本上维持“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提出改善资本主义运行的政策建议。这种理论体系被马克思批评为“没有生气的混合主义”^②。

在约半个世纪之后代替穆勒的上述著作而成为第二本流行的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③。部分地出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动机，作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的马歇尔把当时西方经济学的各种不同的理论，如供求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特别是边际效用论等搜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折衷的理论体系”。按照西方学者的解释，马歇尔把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假设为既存的条件，进而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市场价格，以便解决资源在物品生产上的分配和资源的报酬问题。事实上，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主要内容不外乎论证“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存在。他赞赏资本主义的价格制度，不但声称资本主义是按劳取酬、没有剥削、能使每个人得到最大的满足，而且还说资本主义是一架可以自我调节的机器，能够自行解决其种种矛盾等等。正如马歇尔的一位门徒所说：马歇尔“为私有制企业的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安慰人心的图像”^④。也就是说，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亚当·斯密所宣传的那样的理想社会。在这种美化资本主义的理论之下，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势必被解释为最好的政策，因为，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只能使它变为更坏，不可能使它变为更好。尽管马歇尔的嫡派传人庇古教授，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说法，提出了把钱从富人那里转移支付给穷人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福利的政策建议，但是，整个说来，国家不应该干预经济生活的说法仍然在西方普遍地被接受下来，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还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在此以后，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的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三次比较重大的修改与补充。

第一次的修改和补充涉及到垄断问题。尽管列宁早已指出，资本主义已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仍然把垄断当作“例外的现象”。这种理论和现实的背离严重地损害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宣传上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西方经济学者张伯伦和罗宾逊于1933年以歪曲事实的手法，企图填补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漏洞。^⑤虽然张伯伦和罗宾逊的理论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轰动一时，然而，他们修补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和程度，要远逊于凯恩斯对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作的第二次的修改和补充。

第二次的修改和补充出现于1936年。那时，主要由于西方世界的1929年后的大萧条状态，资本主义社会处于覆灭的危险之中。因此，西方国家日

①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载于阿布特编：《经济学名著选》，405~406页，纽约，德布尔泰公司，1947。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③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版，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890。

④ 罗宾逊：《序言》，载于克赖格尔著：《政治经济学的重建》，2版，9页，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78。

⑤ 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1版，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1933；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版，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3。

益为甚地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标来干预经济生活，以便保证政治上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西方社会的需要。西方社会固然仍旧欢迎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的说法，但是，如果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被解释为最好的政策，那么，西方国家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标来干预经济生活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为了提供这种理论根据，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①。在这本书里，凯恩斯宣称：资本主义的自发作用不能保证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以便解决失业问题。他的意思是，只要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这样，凯恩斯不但维护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的宣扬，而且也为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希克斯于1939年出版的《价值与资本》^②一书代表第三次修改与补充。该书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价值论与一般均衡论。

马歇尔的价值论被称为基数效用论。而基数效用论有两个使西方学者在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假设条件，即效用是可以衡量的和边际效用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减。前者把作为主观心理状态的效用说成是可以衡量的东西很难令人信服，而上面已经提到，根据后者的边际效用递减的说法，货币的边际效用必须也是递减的。按照这一说法，同样的一元钱，它对穷人的效用要大于对富人的效用，因为富人持有的货币收入大于穷人。这样，如果从富人那里取走一元钱而把它给予穷人，那么，整个社会的效用总量或福利便会增加。这种“转移支付”显然不利于资产阶级，从而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必须加以否定的。

在《价值与资本》中，希克斯提出了序数效用论。序数论可以在形式上避免基数论的两个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假设条件，而与此同时又能得到马歇尔用基数论所得到的需求曲线。序数论显然对资产阶级有利。因此，《价值与资本》出版以后，序数论逐渐代替了基数论而成为西方正统经济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该书的出版也对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起到推广和普及的作用。尽管如此，希克斯的这一修改和补充同凯恩斯的第二次修改和补充相比，无论在范围上和程度上显然都居于远为次要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使得整个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出现了显著的漏洞。一方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以个量分析为主，根据对单个消费者、厂商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分析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因素能够自行调节该社会种种矛盾的结论，并据此而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另一方面，凯恩斯则偏重于分析总量变数，根据他所建立的涉及总量变数的理论，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因素不能自行协调来解决失业问题的结论，并据此而主张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这样，在西方经济理论

①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6。

② 希克斯：《价值与资本》，1版，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

体系内部就产生了干预和反干预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种矛盾和不调和之处。

有鉴于此，以萨缪尔森为首的一些西方经济学者逐渐建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该学派把包括第一和第三次修改和补充的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当作研究个量问题的微观经济学，把构成第二次修改与补充的内容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称为考察总量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它宣称，前者是以充分就业为分析的前提，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的情况。因此，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之中，而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主张不过代表同一理论体系所涉及到的两种不同的情况。与此同时，该学派还把现代资本主义说成是“混合经济”，由“私营”和“公营”两个部分所组成，前者的不足之处可以由后者加以弥补。前者的作用系由微观经济学所分析，后者的必要性则由宏观经济学所论证。这样，新古典综合派不但弥补了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内部的漏洞，而且还以该理论体系来继续维护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的说法。

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并且在西方经济学界享有威信。作为这一体系的具体表现的由萨缪尔森所撰写的入门教科书《经济学》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三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材。大致在马歇尔教材出版后的又一个半个世纪，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问世以后，即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被翻译成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成为空前畅销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这种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通货膨胀的恶化而有所削弱。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即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存，给新古典综合派以十分沉重的打击。

按照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当经济活动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时，通货膨胀率应该为零。在经济活动小于充分就业时，那么，不但不会存在通货膨胀，而且价格水平还会下降。只有当经济活动大于充分就业时，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这就是说，该学派的理论表明，失业（经济活动小于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现象是不可能同时共存的。这一结论显然违背存在于西方的滞胀的事实。

新古典综合派不但无法解释滞胀的存在，而且也提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按照它的理论，在失业问题存在的条件下，政府应该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以便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增加就业数量；而当通货膨胀出现时，政府必须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以便降低有效需求，从而消除通货膨胀。这种政策建议在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时便会带来自相矛盾的后果。如果西方国家采用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有效需求的扩大必将使通货膨胀恶化。如果它通过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来制止通货膨胀，那么，有效需求的减少必将降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简言之，医治一种疾病成为加重另一种疾病的手段。在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条件下，政策的选择只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便是近年来，特别在1973—1975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主要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对于这种困难局面，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已经承认无法加以摆脱。

理论的困难和政策的无能严重地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地位。许多西方经济学中的其他派别纷纷对该学派进行抨击和责难，企图以自己的理论在整体或部分上取代新古典综合派，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论提出政策建议^①。参与抨击和责难的各个派别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剑桥学派、新奥地利学派、新制度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其中在政策实践上影响较大的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目前，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已经放弃了“新古典综合”的字样，把自己称为现代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现代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名义，他们在维持原有的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尽量吸收和容纳其他派别的论点，特别是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说法。以如此的方式，新古典综合派的体系企图勉强维持它的统治地位。自从象征该体系成立的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版出现的1948年到该书第15版问世的1995年，新古典综合派体系已经流行于西方经济学界达半个世纪之久。

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时至今日，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看来已经过时，斯蒂格利茨在本书原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话似乎可以说明这一情况。他写道：“萨缪尔森的开拓性的教科书的功绩在于：它第一次成功地把新的（当时被认为如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萨缪尔森使用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概念，即一旦经济被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原有的古典学派的原理便能适用。在实质上，这就是把经济学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在一个部分中，当经济社会的资源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宏观理论便能适用；在另一个部门，当社会的资源达到充分就业时，微观理论就发生作用。这种二者相互独立而很少有关联的理论体系在教科书的写作和课程的教学上得以反映出来；先讲微观、后讲宏观或者把次序颠倒过来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经济学者们已经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割提出疑问。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只有一套，而非两套。然而，这一观点却没有在现有的任何教科书中被反映出来。因此，作为一个经济学入门课程的教师，我感到现有的教科书不能使人们了解现代经济学，即不能使人们理解现代的经济学者如何考察世界的原理以及不能使人们理解为了懂得当前的经济问题而必须具备的原理。当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世纪的时候，我们需要超过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原理。”

很显然，推翻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的体系是本书最重要的特点。当然，这里所说的“推翻”主要指理论框架及其有关的学说，并不是推翻过去的西方经济学的全部原理。

本书能否代替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而成为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是否能成为里程碑是难以肯定的；因为，问题的答案取决

^① 在西方经济学中，“学派”这一名词可以指较严格意义上的不同派别，也可以指较为松散意义的派别。本文所说的学派系就后者的意义而言，它的含义仅仅是具有某些共同学术思想的人们。因此，不同学派之间的共同之处可以远多于它们之间的分歧。

于历史条件、时代需要、作者的威信和地位以及新理论体系的成熟程度等等，而这些都是难于掌握的因素。然而，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下来，那就是，斯蒂格利茨的这本著作至少应该是代替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教科书之一，其原因在于，本书代表着西方经济学的新思潮，而这一新思潮在西方世界正在或者已经取代了萨缪尔森所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

(二) 本书的有用之处

对我国读者，本书的上述特点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本书的有用之处。对其有用之处可以分为下列三点加以说明。

第一，洞悉西方经济学的新潮流和发展的方向。本文在上面的第一部分已经提到，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框架系由宏观和微观两个部分所组成。这一被分割成两部分的理论体系受到了西方各个学派的几乎一致的非难；特别以较年轻的西方学者而言，更是如此。

非难者声称，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而总量不过是个量的总和。例如，整个社会的消费量不过是社会中的各个人的消费数量的加总。由于总量系由个量所组成，而个量又是个人经济行为造成的后果，又由于个人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正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归根结蒂，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应该足以解释宏观现象，从而宏观经济学并没有单独存在的理由。按照这种说法，把西方经济学分成宏观和微观两个部分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不能成立。

基于上述考虑，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向。在70年代，代表这一趋向的专著已经出现^①。十余年以后，明确指出以“微观基础”来解释总量数字的较高深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也已出现^②。然而，据笔者所知，以入门的教科书而论，斯蒂格利茨的这本著作是代表这种趋向的第一本。

在本书中，原有的宏观经济学的名词和论点，特别是凯恩斯主义，仍然大量存在，但是，对这些名词和论点的解释却偏于微观的方面。例如，在过去的教科书中，西方学者往往使用总量生产函数的概念来推演出总供给曲线，而在本书中，总量供给曲线被解释为单个厂商的供给曲线的加总^③。这意味着，总量数字之间的关系是由个量厂商的行为所决定的。其他关于劳动市场和货币市场也采取类似的说明方式。总之，从本书中，读者可以觉察到西方经济学的这一重要的新思潮和发展方向。

第二，理解新近出现的论点和原理。上面已经提到，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在于论证“看不见的手”原理，即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一个理想社会。既然西方学者企图用微观经济学去解释宏观经济现象，那么，他们要遭遇到的

^① 例如，见菲尔波斯（编）：《就业和通货膨胀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纽约，诺顿公司，1970；威因特鲁柏：《微观基础》，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

^② 巴罗：《宏观经济学》，1版，纽约，威利父子公司，1984。

^③ 本书第26章。

一个不可避免的严重问题显然便是，如果资本主义果真像微观经济学所论证的那样理想，为什么它的宏观运行会出现像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等很不理想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论点和新说法加以解释。这些论点和说法包括“菜单成本”、“寻找费用”、“不完全信息”、“隐性工资合同”、“李嘉图式的等价”等等。

斯蒂格利茨打破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也用微观理论去解释宏观现象，同时，他在本书中也对上述的新论点和新说法作出了较多和较完整的论述。这样，读者便能在本书中获得较大数量的有关西方经济理论新动态的信息。

第三，了解西方经济社会运行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目前，西方学者，特别是较年轻的西方学者不但企图用微观理论解释宏观现象，而且还针对微观层次本身出现的现象进行说明。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在过去的50年中，学者们也对经济学和企业经营之间的界限重新加以考察。像公司财政和企业管理那样的学科在过去是被置之于商学院的范围，而在那里，这些学科以不涉及经济理论的方式进行讲授。在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要想了解市场经济如何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我们必须了解厂商的财政和管理。”在这一方面，本书加以论述的委托—代理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在过去，西方学者总是把厂商的主人（所有者）和经理（管理者）视为一人，从而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企业中，不存在二者的利益冲突的问题。然而，在近数十年中，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现象日益明显，同时，企业股东（所有者）与代理人（经理）之间的利益矛盾也日益突出，因此，西方学者开始研究委托代理问题，即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利益分歧问题，以便提高企业效率。此外，新论点和新说法还包括非对称性信息的后果、金融市场的某些弊端、企业在融资时如何在发行债券和股票之间加以抉择、企业的兼并和联合，特别是有敌意的兼并和联合，等等。

凡此种种不但可以使读者进一步了解私有制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而且，其中某些说法还对我国的体制改革有借鉴的意义。再以上述委托—代理关系为例。在我国的体制改革中，我国部分的经济学者仍然受到西方经济学中陈旧的教条的影响，同样认为私有制的企业不存在委托者与其代理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因此，为了提高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效率，他们把改革的重点错误地偏向于所有权的变革，而忽视提高效率应该遵循的一个重要途径，即解决一切所有制下都必然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属于企业管理的范畴，与所有制无关。因此，解决我国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的关键是改善管理，而不应在所有权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当然，除了委托—代理关系以外，本书还有其他的可资借鉴之处。

（三）应加注意的地方

尽管本书存在着有用之处，但是，它仍然是一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作为一本入门著作，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经济学的性质，而西方经济学的性质具有双重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上层建筑是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作为西方社会上层建筑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企图为其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作出贡献。从本文的以上两个部分中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在两个方面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西方经济学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它在意识形态上宣传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另一方面，它也必须为改善、甚至拯救这一制度提供政策建议。

首先，就意识形态的方面来看，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说明，西方经济学的中心思想在于阐扬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而这一中心思想又是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作为西方经济学入门教材的本书当然也不例外。

在本书中，斯蒂格利茨写道：“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私有制的市场可以提供最好的方式来维持经济效率，来保证物品的最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来确保被生产出来的物品能符合消费者的需要。现代经济学对私有制市场的信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1776年的杰作《国富论》。”^①他又说：“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有着很大的进展，但是，他的基本论点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②

由此可见，读者必须注意本书所阐扬的与社会主义原则相对立的思想。

其次，再就本书的政策建议来看。由于这些政策建议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善和拯救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它们都以资本主义的存在为前提。换言之，它们都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解决市场经济的各种问题的方法。

然而，我国推行的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这一基本国情的差异，即使本书的政策建议能在西方国家生效，对我国而言却未必如此。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即使是所谓“转动钥匙就能启用”的建设项目，也就是把发达国家的工厂全盘照搬到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其中的绝大多数也会遭受失败的命运，其原因正在于国情的差异。因此，国情的差异也是读者应加注意之点。

最后，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西方经济学著作的某些特点也易于使初次接触到这些著作的读者产生误解。例如，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意义比较松散的名词，因此，它的内容往往比较庞杂；从完全与意识形态无关的经济管理方法到专门从事意识形态宣传的经济理论都可以构成它的内容。由于初学者尚未看到西方经济学的全貌，所以当它们仅看到它的经济管理方法的部分时，他们可能据此而认为，西方经济学是超越意识形态以上的管理方法，从而适用于任何社会。另一方面，当他们只接触到纯粹经济理论时，他们也可能得到西方经济学全然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品，对社会主义毫无价值的印象。当然，这两种结论都具有片面性，来源于对西方经济学的误解。此外，西方著作还有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其他特点，如对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有夸大，甚至失实之处等，在这里不能一一加以论述。

① 本书第174页（原文页数）。

② 同上。